

修养艺德应成明星从艺关键一课

无论哪个时代，艺德都应成为文艺从业者的精神底色。真正让艺术家走入观众心里、成就其艺术生涯的，恰恰是“艺德”二字

话的真正含义。

娱乐明星在公众场合受关注度，通常在机场会将自己包裹得很严实，以规避被“狗仔队”、狂热粉丝打扰的麻烦，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这不应成为明星“搞特权”的理由。如果曾轶可在第一时间按工作人员要求脱帽配合面相比对，通过理性的方式与执法人员进行沟通、相互体谅，可能都不会引爆舆论。

事实上，曾轶可并非明星艺人在公共场合起冲突、情绪冲动的第一人，类似事件也往往以明星艺人致歉而告终。复盘这些事件，有的明星把任性当个性，不开口直接动手；有的明星通过微博发表“触目惊心”的不当言论，或发动粉丝声讨，掀起舆论风波……此类失范行为背后，是明星艺人习惯了花团锦簇、众星捧月的生活，放弃了对自己艺德的修养和追求。

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媒体、粉丝的过度追捧，助长了部分明星艺人自我膨胀、有恃无恐

的心态。在艺人比大师更容易成为舆论焦点的风潮里，艺人似乎更容易迷失自己——他们缺少对艺人的公众人物身份和社会责任的思考，却多了傲慢；少了对演艺职业的敬畏和从艺所需的思想积累、文化修养，却多了浮躁。因为这些原因，自然很难管好自己的言行。

于是，在“流量即正义”的指挥棒下，有的艺人只关注如何能“爆红”，只知道追逐名利，缺乏对艺能的基本训练，导致某些艺人演技靠抠图、演唱靠假唱；有的明星一旦被捧红就飘飘然，追求前簇后拥的“高端配置”和众星捧月的“偶像特权”；有的艺人缺乏自律，漠视法律和道德约束，吸毒、嫖娼等事件频发；还有的明星热衷于吸晴，只闻其声，不见其作，依靠商业炒作和出位言论吸晴，混迹于“热搜”……

必须看到，部分艺人的行为失范，不仅将艺人群体和演艺圈卷入舆论漩涡，更对那些视艺人为偶像的年轻观众的价值取向

和人格养成产生误导。事实一再证明，犯了错却还试图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鼓动粉丝给有关方面制造舆论压力的做法，不仅行不通，还会“反噬”自己。

文艺终究是铸造灵魂的工程，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如今当我们提起“艺德”等字眼，大家首先想到的仍是哪些忘我排练、带病上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老戏骨、老艺术家们。其中缘由，既在于老戏骨们留下了诸多经典作品，也因为他们注重艺德和个人修养。这种反差，值得年轻艺人们反思。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真正让艺术家走入观众心里、成就其长久艺术生涯的，恰恰是“艺德”二字。艺人作为公众人物，每时每刻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为社会做表率。

无论哪个时代，艺德都应当成为文艺从业者的精神底色，成为明星从艺的关键一课。对年轻艺人们而言，与其追逐热度，不如追求作品的温度、力度与筋骨；与其炒作流量，不如潜心于艺能的磨砺、艺德的修养；与其在线上线下“磨出位”，不如挺直腰板，放低姿态，扎根生活，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行者，以优秀的文艺精品实现曝光度，赢得观众实实在在的关注与尊重。

本报记者吴文诤、乌梦达

近期，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地集中关停大批政务新媒体，引发舆论关注。在浙江省长兴县，220多个镇级、村级政务类微信公众号停止运营，数量占到全县微信公众号数量的80%；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首批关停的政务类微信公众号、微博数量超过总量的70%。

政务新媒体在推动政务信息公开、方便群众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当初“一哄而上”开设政务新媒体，也导致了不少问题。比如，部分政务新媒体不懂运营，让账号成为“僵尸号”，被盗号都不知道；还有一些政务新媒体格调低下，怒怼网友，引发争议；更有不少政务新媒体被流量思维绑架，为追求“10万+”而大玩标题党，甚至买粉刷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些地方在发展政务新媒体方面，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强制要求基层公务员关注、点赞和转发，基层对此也诟病已久；再比如，有些基层部门本来人手紧张，却不得不安排专门的“小编”。正因如此，如今有关部门出台文件要求对政务新媒体进行清理整合，很多基层“小编”如释重负。

不过，在清理整合过程中也要注意，当初“一哄而上”开设新媒体的做法不妥，如今也不宜“一哄而下”。有的地方发布文件，规定粉丝少于一定数量就关停，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没有准确把握中央要求，也是对政务新媒体功能缺少准确认知的表现。须知，政务新媒体的关键是政务信息发布，不能简单地以流量论英雄。

各地也要防范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些职能部门可能会趁着这次清理整顿行动“甩锅”，把不该关的政务新媒体也关了，进而“光明正大”地不作为。不搞政务新媒体，工作人员确实轻松了，但百姓获取信息的便捷程度也将大打折扣。难道还要求大家像10年前一样去政府网站找信息？

事实上，各个领域、各地都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政务新媒体，既做好了政务发布，又在形式上不断创新，让百姓喜闻乐见。比如，最近在四川宜宾长宁县地震之后，“宜宾发布”“长宁发布”的表现就可圈可点。值得学习。

从前些年开通政府网站到现在的运营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公号、政务抖音，这是大势所趋。政务信息发布要实现有效传播，就应该有受众意识、用户意识，要与时俱进。比较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对政务新媒体的功能、定位有比较清晰的认知，要知道该发什么不该发什么；同时，找到政务新媒体那些问题的症结所在，有针对性地来解决。

关停政务新媒体别「一哄而下」

画里有话

痛风药之痛

有痛风患者反映，常用药别嘌醇片在2010年是6.5元/100片，到2016年就开始疯涨，到2018年初涨价到72元/100片。但即便价格暴涨，此药却因“原料难求”，鲜有企业生产，各大医药公司都处于缺货状态。

漫画：曹一

如果原料难求真是因为垄断，有关部门应当查个究竟，需要“有形之手”从源头上消除药品原料价格异常上涨的动力，同时建立有效的常用药储备、检测、应急机制，确保常用药不短缺。

点评：刘婧宇



支持社会办医不是撂挑子而是压担子

本报记者杨绍功

近期，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大政府支持社会办医力度，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此举让不少网友疑虑：这是否意味着把医疗保障的责任甩给了市场，能不能靠多办些公立医院来解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从人们的就诊习惯能发现这种疑虑是普遍的。近期，有媒体发起的一项有7.6万名网友参与的网络调查显示，84%的网友平时会选择去公立医院看病，到民营医院或社区医院看病的只有4%，去私人诊所和在线问诊的有7%。都往公立三甲医院挤，人们自然会想：为什么不能通过鼓励多建公立医院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关注近年来不断深化的医疗服务供给结构性改革，就不难发现，医疗服务需求在发生变化，单纯增加公立医院不能解决问题。首先，医疗服务需求存在分化，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医疗服务还不能满足，不少高收入群体多元化的医疗需求更存在巨大缺口。其次，医疗服务的内容在变化。非传染性疾病多发，医疗服务要拓展为预防、治疗、保健相结合的健康综合管理。第三，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从2009年的4.83%上升到2018年的6.4%，也让我们必须要考虑如

何更有效、更可持续地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而不是一味地扩建公立医院。为此，中央提出了医疗卫生服务改革的方向——“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要有作为，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要有活力，要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括：疾控、计划免疫等公共卫生服务，以及使用基本药物、适宜技术的基本医疗等。向市场要活力来解决非基本医疗需求的问题，并不是把兜底的责任抛给市场。实际上，反倒是非基本医疗需求挤压了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造成了医疗资源的紧张。公立三甲医院人满为患，而低级别的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却门可罗雀。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就曾表示，三甲医院的门诊患者中有35%以上是根本不需要到三甲医院看病的，人满为患三甲医院挤带来严重后果：医务人员超负荷工作，病人就诊效率下降，医院不断追加病床和设备却无法满足不同需求。

其实，即便是公立医院停止扩张，社会办医要迎头赶上也不是容易的事。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有2万多家民营医院，公立医院只有1.2万家，但是公立医院床位有480多万张，民营医院只有171多万张，公立医院有人员570多万人，而民营医院只有162万人。无论是规模体量、人才数量还是综合技术优势，社会医疗机

构完全无法与公立医院相提并论。

社会办医无法与公立医院并论，但公立医院无法覆盖的医疗服务却需要社会办医来填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康复、护理、医养结合服务需求将大幅增加；儿科、精神科、妇产科、眼科、医疗美容等专业领域的服务仍然紧缺；需要更多医学检验、血液透析、医学影像等领域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在这些方面，社会办医无疑可以成为公立医疗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比如，近年来，在长三角的上海、苏州等地，以社会办医形式引进了国际上知名的医疗机构，形成了高端医疗服务业的集聚区，既满足了居民的需求，又塑造了医疗服务地标产业。

梳理社会办医存在的问题，原因主要有几个：一是市场准入不健全，导致社会办医打擦边球，医疗暴利、医疗诈骗等不良问题多发；二是监管措施不到位，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体系，甚至是简单以审批代替监管，导致无法及时纠正社会办医存在的问题；三是支持和引导不足，与公立医院差异化竞争未能实现，让社会办医难以良性发展。因此，可以理解，十部委发布意见大力支持社会办医，其实不是向社会撂挑子，而是要给各级地方部门压担子。只有结合地方实际不断探索创新，有可能破解这些难题，用好社会办医这个渠道，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差异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5G 能破解英国“生产力之谜”吗

本报记者桂涛

英国历史上就是个善于先人一步的国家。最近，英国正式步入5G时代，成为继韩国、美国之后全世界第三个实现5G商用的国家。

英国电信运营商EE宣布，在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6个主要城市开通5G服务，并将以每月超过数百个5G站点的速度建设网络，力争今年内完成1500个5G站点部署，新增10个城市的5G覆盖。

现在，一些英国用户在自己的5G手机上就可以体验到每秒1Gb的高传输速率，英国广播公司还进行了全球首场基于5G网络的电视直播。人们不禁想象，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带来的高速连接将如何造福英国。英国的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一个命题：5G能否帮助英国提高生产率？

“生产率之谜”是长期困扰英国的问题。从1970年到2007年，英国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约2.4%，而自2007年以后，生产率增长就近乎停滞，特别是制造业领域。这一现象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改观，但比起德国和法国却低了不少。生产率是单位工作时间内产出的物品和服务价值。人们对英国生产率的低增长莫衷一是，较被广泛接受的原因包括投资不足、资源配置扭曲和创新增长缓慢。

为了提高生产率，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的改进是这些发展战略的核心。人工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以及最新的5G等技术的发展都为推进数字化提供了动力。5G提供的可靠、超低延迟连接和大规模机器通信都为企业带来无尽遐想。

我在与英国企业界人士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对5G的到来似乎已有共识：5G并不仅仅是比4G更快的速度，而是对游戏规则的改变，比如5G将释放物联网设备的巨大潜能。英国媒体已经在讨论5G时代初期，企业如何与政府及网络运营商协商，加速接入速度、整合设备与服务，让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快速、安全、低成本，通过数据的分析与调配让员工的工作环境更加科学高效。

初期的预测显示，如果抓住5G带来的机遇，英国的生产率可以至少提高1个百分点。

但用5G技术加速英国生产率的提高也并非坦途。多数企业对5G在制造业商用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有所顾虑，数字化转型也不仅意味着硬件的改善，还将带来员工技能提升方面的花费，比如传统工程师就需要通过转型来获得开发、部署与监控自动化流程方面的本领。5G时代的来临也让目前的商业模式、创新创意方法、风险管控等流程与环节需要重塑。

毫无疑问，5G要到推广并迅速推动生产率提升，需要包括政府、社会、商业领袖、移动网络运营商、技术领导者甚至是在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各方协力，这对倚重自由市场经济的英国来说是一大考验。

更何况目前“脱欧”在英国政坛与商界划出深深裂痕，“无协议脱欧”概率的攀升为商业投资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英国在5G商用领域能否继续领先、5G能否帮助英国打破低生产率魔咒，都不得而知。

乐见“代收垃圾网约工”带来新变化

然玉

7月1日即将在上海实施的“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催生了大批新兴职业，“代收垃圾网约工”便是其中之一。“绿色职业”与“网约工”相结合，不仅改变了这一职业的工作方式，也让垃圾回收小哥月入过万元成为现实。“代收垃圾网约工”，顾名思义，就是客户通过线上预约，线下收废品小哥上门回收并将垃圾分类打包，把纸制品送到纸厂，把塑料送到粉碎厂。(6月20日中新网)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上海“最严垃圾分类”的各种消息持续刷屏，并引发了一系列公共讨论。一些网友由于部分上海市民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抛出了所谓“我们是否适合垃圾分类”的诘问。对此，专业媒体则从生活习惯、素质养成等各方面加以探讨和回应。应该说，这种充分的深度论辩，有助于全社会加速形成关于“垃圾分类”的认同和共识。当然，理解这一环新变化，也可以有很微观的切入点，“代收垃圾网约工”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垃圾回收服务的升级以及垃圾分类的精细化、高效化，将是**大势所趋。推进“垃圾分类”，还有很多新的可能**

说，这种充分的深度论辩，有助于全社会加速形成关于“垃圾分类”的认同和共识。当然，理解这一环新变化，也可以有很微观的切入点，“代收垃圾网约工”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代收垃圾网约工”也算是个新职业。在过去，我们对垃圾回收人员甚至都没有一个专门的称谓。“捡垃圾的”“拾破烂的”，这些极其随意且略带嫌弃的称呼，直观地表明了垃圾回收从业者地位之低以及市民对垃圾回收本身的习惯性漠视。近些年来，“垃圾回收员”“代收垃圾网约工”等横空出世，这一职业

群体的人员结构、工作方式以及社会角色，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对于推进“垃圾分类”，显然是一件好事。

一直以来，从事垃圾回收的基本都是大爷、大妈，他们的行为逻辑原始而明确——翻捡垃圾桶，找出纸箱、塑料瓶，卖钱。尽管我们承认，捡垃圾的大爷、大妈们为垃圾分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种低效且简单粗暴的垃圾分类模式，势必难以匹配未来社会的需求。随着更多年轻从业者进入这一领域，随着资本搭建起新的平台，